

· 藏书家与藏书楼 ·

缥緗盈栋，精本充牣

——仁和朱氏结庐藏书研究

李雄飞

藏书史与书史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作为人类文明传播和延续的一种重要方式，藏书早已成为一种文化而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。江南地区是我国藏书文化的发达地区，这里不仅是经济上的富庶之地，鱼米之乡，而且是人文之渊薮，文明之沃土。明清之际，特别是清中期以前，以长洲（今苏州）、金陵（今南京）、仁和（今杭州）为中心，刻书、鬻书、藏书之业炽盛。浓郁淳厚的文化氛围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大家巨擘。清中期以后，国家虽内势疲弱，外遭强凌，江南之地更是烽火连天，兵燹不绝，然藏书文化之源脉并未因之而绝绪断流。特别是道咸之世浙江仁和之朱学勤、广东丰顺之丁日昌、湖南湘潭之袁芳瑛，堪称此间乃至近代江南藏书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。

一、仁和朱氏家学源流

丰润张佩纶曰：“仁和朱氏，其先随宋南渡，定居唐（塘）栖之丰田，介杭、湖两郡间。五世祖讳世荣，领康熙间乡荐，为南康令，有声。曾祖讳华，祖讳椿，均入仁和县学。”“考以升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进士，顺天顺义县知县。”“三世皆嗜学劬古，顺

义君（即学勤父以升，因曾官顺天府顺义县知县故称）兄弟尤潜研经史，求假善本，手自勘校”^①，于毛诗最擅。

朱学勤字修伯，生于道光三年（1823）。三岁时，母卓氏弃世，父远游他乡教授，学勤即师事伯父朱以泰。其自幼聪颖明敏，张佩纶称之“童牙振采，弱冠蜚英”。^②读书能过目不忘，有“神童”之目。然不为幼誉所累，用功至勤，常秉烛夜读达旦。十年萤雪，学终大成。年十六应郡试，学使姚元之（字伯昂，号荐青，桐城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官至左都御史）异其才隽，叹曰：“此陆敬舆、马贵与俦也！”^③陆敬舆即唐人陆贽，字敬舆，浙江嘉兴人，年十八成进士。马贵与即宋之马端临，字贵与，江西乐平人，咸淳中漕试第一，时年亦未及二十。“三通”之一的《文献通考》即马氏力作。陆、马二人皆博极群书，且少年异才，能与这两位著名才子为俦，足见学勤才学之博雅。及父释褐，“侍顺义君官舍，质问群经疑义，尽得父学。”^④咸丰元年（1851）中顺天乡试，三年成进士，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，直军机处，为军机领班，先后典机密十有七年，屡建殊功，名满朝野，乃咸同间肱股干臣。其才气凌厉，为曾国藩所赏识，尝握其手曰：“学足论古，才足干时，后来之重器也。”官京师余，与邵懿辰、王拯、阎敬铭、丁宝楨等一时魁奇髦杰过从甚密，讲求经世之学。平生之著述存世无多，计有《结庐遗文》二卷、《集》三十卷、《读书杂识》二十卷、《枢垣日记》三十卷。“虽篇帙无多，然先生学问淹雅，器识闳通，犹可窥见万一。”^⑤

学勤育有二子，长子澄，字子清，江苏补用道；次子潜，字子涵（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作字子安，子涵之误也），署顺天府治中北路厅同知。二子皆笃守家学，博学洽闻，尤其是长子朱澄。始聚于学勤的结庐藏书，最终即由朱澄发展至鼎盛。

二、结庐藏书之聚

朱学勤自幼生长在明山丽水、文才辈出的杭州。此间聚书之

传统由来已久，多收藏大家，如中前期之吴瓶花（焯）、孙寿松（志祖）、汪振绮（宪）等，对学勤的影响甚大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学勤夙染此遗风，更兼家学之熏沐，好书尤甚。张佩纶云：“公（学勤）益事搜讨，积聚篇卷，最擅精博，为海内所推。”^⑥早在道光末年，他就开始访书、聚书。及咸丰癸丑（咸丰三年，1853）通籍，官于京师，更是利用公暇搜讨厂肆，但见佳刻精抄，不惜重金购藏，由此收藏日富，渐成京城收藏名家。他将所藏中之佳本悉载往江南家中，筑室以储。佩纶云：“矧承廷诰，业富缥緗。龙威灵宝，石室斯藏。假之闲福，俾老江乡。结庐五亩，买山一房。二分水竹，万轴琳琅。药炉茶灶，二子侍旁。经传刘向，说衍毛茌。针育起废，神明以康。天胡吝此，悠悠彼苍。”^⑦此即结一庐之来历。然而此时之结一庐，虽已成“万轴琳琅”之富，但并未至繁盛之极。学勤既歿，其长子澄承乃父之衣钵，聚书不辍，续写结一庐之辉煌。澄邃于版本之学，曾与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订交。据缪氏云，澄每谈及“版本之得失、书籍之源流，四部、七略，如瓶泻水。”^⑧而其搜讨旧籍之力，比起乃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缪氏又云：“公清子清，尤工搜访，冷摊小市，无往不到，所得益多。”“仁和朱修伯先生广收图籍，藏弃甲于京师。其嗣子清观察搜罗更广，储皮益富。”^⑨经其十余年不遗余力之搜访，结一庐藏书更渐丰富，精本充牣，名甲江南。光绪庚寅（光绪十六年，1890），澄病歿，其身后结一庐之遗书竟有八十柜之巨。

长沙叶德辉云：“结一之藏，多出於仁和勞氏丹鉛精舍、長洲顧氏藝海樓、南昌彭氏知聖道齋。”^⑩

仁和朱氏世居塘栖鎮（今屬余杭縣），這個地處杭州之北、運河之濱的秀麗水鄉，素有藏書的傳統。明有呂坤的“樾館”、卓氏三代的“傳經堂”，清代則以勞氏“丹鉛精舍”最為著名。勞氏藏書始於勞經元。經元字笙士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，顧志興先生著《浙江藏書家藏書樓》中誤作“笙生），嘗問學於武進著名學者

臧辅堂（庸）门下。性嗜聚书，购求善本而不惜重值。有子三：长名检，字青玉；次名权，字巽卿；三名格，字季言。权与弟格皆弃举业，专攻群史，精于校讎之学，亦能世其家学，喜藏书。其藏书楼名“丹铅精舍”，藏书多精善之本，繁富称于东南。学勤与劳氏兄弟同里、同时，且与劳氏丹铅精舍藏书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其幼时即常往劳家借书观读，对劳氏藏书爱不释手。劳家对他也是格外关照，有时还允其将书借回家中。学勤非常珍惜这种机会，每携书归家，常昼夜抄诵。毋庸置疑，朱学勤能成就博学高才，并亦踵聚书之途，劳氏丹铅精舍藏书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而学勤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，日后能成为丹铅精舍藏书的主人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劳格卒，其藏书散落各处，其中一部分为学勤所得，多为名家精校本。

顾沅字湘舟，长洲人，道光间官教谕，收藏旧籍及金石文字甲于三吴。其藏书楼名为“艺海楼”。杨子勤（钟羲）云：“顾湘舟艺海楼藏书不及《四库》六百余种，而《四库》未收者二千余种，亦吴下嗜古之巨擘也。”庚申（咸丰十年，1860）之劫，艺海楼书散，多数为丰顺丁日昌所得，朱学勤亦得之不少。有文献说艺海楼藏书为丁日昌所尽得，此非实也。顾氏艺海楼不仅聚书，而且抄书，其抄本之精善闻于大江南北。学勤所得艺海之藏中，绝大多数为其抄本。检四卷本《结一庐书目》，其中著录为“元和顾氏艺海楼传抄阁本”者有近百部之多。

南昌彭元瑞，字掌仍，一字辑五，号云楣。少年敏慧，及长“尽通经传百家之书”。登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先后充国史馆、四库全书馆副总裁，实录馆总裁。卒谥文勤。元瑞以文章闻于天下，且雅好典籍，家富藏书，其藏书之所名“知圣道斋”。据其私藏书目《知圣道斋书目》著录，有各类典籍一千一百三十部。南昌彭氏抄本亦享誉书林，学勤所得彭文勤公藏书中，多为知圣道斋抄本。

结一庐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，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流散出来的怡府藏书。

怡府藏书即怡亲王府之藏书。据陆心源《宋槧婺州九经跋》云，怡亲王乃清之宗室，第一代怡亲王即康熙皇帝的第十三子允祥。在康熙的众皇子中，允祥以勇武见称，亦喜文雅，好聚书。其府内有藏书楼名“乐善堂”，凡九楹，珍籍满藏。乐善堂藏书多得之于江南名家巨楼。清初号称“冠于东南”的常熟钱氏（谦益）“绛云楼”，其藏书之宋元精本早已归毛氏“汲古阁”。“绛云之灾”后，“脉望馆”旧本归于钱氏（曾）“述古堂”。“汲古阁”与“述古堂”书散后，大半归于昆山徐氏（乾学）“传是楼”和泰兴季沧苇（振宜）。康熙末年，经何焯鉴定并介绍，徐、季之书售与了怡亲王府，故怡府之藏，实集明清江南藏书大家巨擘之精华。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，此时的怡亲王府早已败落，藏书多售与琉璃厂。时学勤官居京城，稍得闲暇便往厂肆，广搜遍寻，不计重值，故得之甚多。此事文献多有记载，如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云：“当驾幸木兰之后，怡邸散书之时，学勤供职偶暇，日至厂肆，搜获古籍，日增月盛。”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云：“咸丰庚申，英人焚淀园，京城戒严，持朱提一笏，至厂肆即可载书兼两，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。”从中亦可看到，怡府败落，更兼遭逢乱世，书价是相当低的，朱学勤也趁此良机，大捞了一把，使家藏陡富。

朱学勤聚书的年代，正值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。清廷的腐败无能招致内外交攻，国势危如累卵。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焰燃遍南国红土，帝国主义列强的长枪利炮直指国府京畿，连年战火使得文化事业惨遭涂炭。江南藏书大家之书，或毁于兵燹，或流散于冷摊小市，境遇凄凉，殊不堪睹。叶德辉云：“洪杨之乱，江以南图书之厄，酷于五季。其兵燹所残剩者，北则归于聊城杨氏‘海源阁’，南则归于侍郎‘结一庐’、丰顺丁氏‘持静斋’、湘潭袁氏

‘卧雪庐’、归安陆氏‘皕宋楼’。”^①当时流散出来的江南大家藏书，有很大一部分流至尚显太平的文化中心——古都北京，辗转买卖于厂肆书摊之间。朱学勤整日徘徊其间，不仅购得了不少怡府藏书，还搜罗了许多其他藏书名家的遗书。“及官京师，又值徐星伯、韩小亭、彭文勤公及怡邸之图书散落厂肆，不惜重值购藏，遂为京师收藏一大家。”^②徐星伯名松，字星伯，大兴（今属北京）人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精于史事，长于地理，好钟鼎碑碣文字。家富藏书，中多善本。韩小亭名泰华，字小亭，文绮之孙，仁和人。道光时，由兵部郎历官陕西粮储道。公余搜访金石及宋元名家之文集，得百数十家，半系传抄精本，或《四库》所无而元刊尚在者。晚年居金陵，筑“玉雨堂”藏书。

以上诸名家之藏，构成了结一庐藏书的主体，同时也奠定了其咸丰年间，士大夫藏书三甲之一的地位。

三、结一庐藏书的特点
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结一庐藏书的特点，那么本文的题目是再恰当不过了。“缥緗盈栋”称其富，“精本充牣”言其精。“富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1. 数量巨大：

“史圣”司马迁有一句名言——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古人常将此言作为读书人的治学之道，更将其视为成就巨学鸿儒的必经之途。然而古来能称为巨学鸿儒者毕竟是凤毛麟角，故“读书破万卷”已非易事，而要藏书万卷更是何其难也！据载，朱学勤曾编有《结一庐书目》以纪其藏，然目中并未尽纪其所有。学勤既歿，澄蓄书不辍，并亦编有书目。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云：“《结一庐书目》一册，传抄本，朱澄撰。”“子清家学涵濡，嗜古尤笃，即此一编，高出寻常收藏家万万，为光绪庚辰（光绪六年，1880）吾友黄再同所贻。己丑（光绪十五年，1889）冬间，相遇

沪滇，子清曾言续有所得，出此目者几及一倍。”可见，澄目亦未尽全详，且藏而未录者几近此目之一倍。“结一之藏”终有几何，如今已无从稽考。虽有“结一之目”以传，然未能由此得以窥全豹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仍可从中略见结一庐繁富之一斑。经对几种版本《结一庐书目》的不完全统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字：共收书一千余种，三万四千余卷。如果按缪氏所言“出此目者几及一倍”作一估算，则有约两千种，近七万卷。笔者以为，这只是最保守的数字，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。

我们再把结一庐藏书与“清末四大藏书家”作一横向比较：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 1194 种，10 万余卷；归安陆氏十万卷楼聚书 15 万卷以上；杭州丁丙八千卷楼富藏 20 万卷；聊城杨氏海源阁蓄书 3236 部，208300 卷。“结一之藏”，富虽难与瞿、陆、丁、杨四氏相埒，然亦“高出寻常收藏家万万”，堪称当时巨擘。也许卷册的数字听起来比较抽象，那么还有一个数字也许会给您一种极为深刻的感性认识，那就是澄歿时，遗书竟达八十柜之巨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完全以私人之力，聚得如此富藏，是极为不易的。

结一庐藏书量虽大，但分布很不均衡，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集部。四卷本《结一庐书目》卷一著录经部书 85 种，卷二史部书 104 种，卷三子部书 141 种，此三卷之总和为 330 种，尚不及卷四集部一卷之数（380 种）。“结一之目”之所以蝇头虎尾，其因有二：一是书籍自身的发展所决定的。我国古籍浩如烟海，而就其内容而言，由于政治、历史等诸多因素的作用，其发展并不平衡。在现存的古籍中，集部书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经、史、子三部，这一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书目中均有突出反映；二是藏书来源所致。结一庐藏书的原藏家中，有许多都是以专门收集集部书而著称的。如前文提到的韩泰华，就以收宋、元名家之文为乐，搜访十余年，得百数十家。

2. 来源广泛：

叶德辉云：“窃尝综诸家书目观之，其收藏皆先有三二故家大宗之书以立其基址，而后陆续增益，用底于成。”^⑬此言道出了古代私家藏书的规律。“结一之藏”亦不例外，它以仁和劳氏丹铅精舍、长洲顾氏艺海楼、南昌彭氏知圣道斋等江南数故家大宗之书为基址，又经学勤父子肆力广搜遍访，日增月盛而成江南藏书之巨擘。检四卷本《结一庐书目》，各书后多著录前藏者姓名，从中可见，除劳、顾、彭三氏旧藏之外，尚收有明晋府、山阴祁氏澹生堂、鄞县范氏天一阁、常熟钱氏绛云楼、毛氏汲古阁、金陵黄氏千顷堂、秀水朱氏曝书亭、桐乡鲍氏知不足斋、金氏文瑞楼、昭文张氏爱日精庐、璜川吴氏、诸城刘氏，以及惠氏红豆斋、吴郡赵宦光、曹棟亭（寅）等南北诸名家之藏，有近百家之伙。正是得此百川细涓之汇，而终成“结一”瀚海汪洋之大观。

“结一之藏”的过人之处在于“多而不滥，既博且精”。学勤父子在蓄书过程中，非常重视对善本的收集，力图于“博”中求“精”，强调藏书的质量。“讲求善本”是历代藏书家的共同特点，但不同时代的人，对“善本”的认同标准是不同的。张之洞曾说：“善本之义有三：一足本（无阙卷，无删削）；二精本（一精校，二精注）；三旧本（一旧刻，二旧抄）。 ”^⑭丁丙则将善本书归为四类，即旧刻、精本、旧抄、旧校，并逐一阐释为：“一曰旧刻。宋元遗刊，日远日鲜；幸传至今，固宜球图视之。二曰精本。朱氏一朝，自万历后，剞劂固属草草。然追溯嘉靖以前，刻本多翻宋槧，正统、成化刻印尤精，足本、孤本所在皆是。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，萃其遗帙，择其最佳者，甄别而取之。万历以后，间附数部，要皆雕刻既工，世鲜传本者，始行入录。三曰旧抄。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、四明天一阁范氏，二家之书，半系抄本。至国初小山堂赵氏、知不足斋鲍氏、振绮堂汪氏，多影抄宋元精本，笔墨精妙，远过明抄。寒家储藏，将及万卷，择其尤异，始著于编。四曰旧

校。校勘之学，至乾嘉而极精。出仁和卢抱经（文弨）、吴县黄尧圃（丕烈）、阳湖孙星衍之手者，尤校雠精审。他如冯己苍（舒）、钱保赤、段茂堂（玉裁）、阮文达（元）诸家，手校之书，朱墨灿然，为艺林至宝。补脱文，正误字，有功于后学不浅。”^⑧张氏、丁氏所言，反映了近代藏书家的“善本观”，而朱氏结一庐藏书更是这种“善本观”具体而真实的体现。四卷本的《结一庐书目》可以说就是结一庐藏书的善本书目，目中著录无不为旧刻、精本、旧抄、旧校者。再看《别本结一庐书目》，内分宋版、元版、旧版、抄本（内含旧钞、旧校）、通行本，更是与丁氏所言毫无二致。具体来讲，结一庐藏书所体现出的“精善”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佞宋嗜元。

藏书崇尚宋元之风发轫于明，经钱谦益、毛晋、钱曾、季振宜、徐乾学等相继大力提倡而渐兴。至清中期，由于乾嘉考据学派的推波助澜，此风蔚然炽盛，对以后的藏书文化影响至深且远。一时间，“南北书贾莫不以宋、元版本为佳货，学者亦以得之为荣。”^⑨结一庐所藏宋元旧刻并不多，见之于《结一庐书目》的有百余种（宋版35种，元版近80种），虽不及“皕宋”、“百宋一廛”、“千元十架”之豪富，然其中亦不乏稀见之本。如宋十行本《晋书》、宋刊《东西汉会要》、《宋诸臣奏议》皆世所罕见；元刻《农桑辑要》亦极稀见。

（2）重名抄本。

抄写是书籍流传的一种重要方式，不论是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还是之后，其对文化的保存与传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。抄本之所以被视为善本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多为官府鼓励刊行的经、正史、应试之书等以外的书籍；或是不易刊行的书籍，如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等鸿篇巨帙。从内容上来讲，它是刊本的重要补充；而由名人手抄的本子，本身就是一件极富价值的藏品。因

而，抄本历来为藏家所重而着力收藏。朱氏结一庐藏书亦不例外，检四卷本《结一庐书目》，共著录旧籍七百余种，其中抄本四百余种，竟几占全目之七成。其中多为名家抄本，如元和顾氏艺海楼抄本、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、仁和劳氏丹铅精舍抄本、山阴祁氏澹生堂抄本、常熟毛氏汲古阁抄本、昭文张氏爱日精庐抄本等等，可谓精抄琳琅。朱氏结一庐不仅富聚名家名抄，其自家抄本在清末亦极具盛誉，为后世藏家所重。

(3) 多精校本。

校本古已有之，但宋、元、明本中并不多见。清代朴学大兴，学者讲究考据、校讎，藏书家精于校勘，时常互易所藏而相抄校。如学勤之前辈仁和汪宪（字千陂，号鱼亭，有振绮堂，富藏书），与同郡诸藏家小山堂赵氏、飞鸿堂汪氏、知不足斋鲍氏、瓶花斋吴氏、寿松堂孙氏、欣托山房汪氏等经常互借家藏抄校。所批注之内容，或阐述本旨，或增补辑佚，或探源发微，学术价值很高，故名家精校本亦为藏家极力搜讨之善本。在各家校本中，清末藏家学者尤重“顾批黄校”，皆以得之为耀。朱氏结一庐即收有顾千里（广圻）精校本数种，其他如明叶林宗（奕）校本、清彭文勤公校本、卢抱经校本、何义门（焯）校本、严铁桥（可均）校本、鲍氏知不足斋校本、翁覃谿（方纲）校本、钱塘吴氏（焯）绣谷亭校本等等，皆一时之名儒鸿学之精义真迹。

四、结一庐藏书之散

叶德辉云：“物聚必散，是固然矣。”^⑦

“穆宗毅皇帝（即同治皇帝）崩，公（学勤）在告中彊起仆地，病日增剧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正月四日遽卒于位，年五十三。”^⑧朱氏结一庐藏书传至第二代，朱澄承乃父遗志，将“结一之藏”推至鼎盛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澄卒，历经朱氏父子两代人苦心经营达四十余载的结一庐藏书，最终未能摆脱叶氏言中所阐发的盛

极必衰的自然规律。

学勤既歿，“结一之藏”传于二子。“长子澄，仕江左不得志，藏书为东南最。其仲潘，奉太夫人（学勤妻马氏）居京师，蒔花种竹，以娱其亲。日与诸名士游，而轻世肆志焉。”^⑩可见，学勤死后，结一庐藏书基本是由其长子朱澄管理的，而次子朱潘则居京奉亲。澄歿，书也就很自然地传给己子，而其子不能守，遂使祖父倾毕生心血购置的万卷缥緗易姓别归。

澄子欲鬻家藏的消息传出后，引来众藏家上门求购。张佩纶云：“朱氏之书为陆心源谋购甚急，佩纶乃告内弟子涵以先世所藏不可轻售，属子涵敦谕其姪，以书暂质佩纶，属为编外舅藏书之目。”^⑪陆心源字刚父，号存斋，晚称潜园老人，浙江归安人，亦清末藏书大家，其珞宋楼藏书名播海内外，在这次争购结一庐藏书的过程中，时官居金陵的张佩纶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凭其与朱家的特殊关系，在竞争中抢得先机，击败了众多竞争者。张佩纶字幼樵，号绳叔，一作绳庵，别署笈斋，直隶丰润人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进士，光绪间累官侍讲学士，署左副都御史。庚子（光绪二十六年，1900）赏给翰林院编修，以四品京卿补用。佩纶乃学勤婿。学勤有三女，次适佩纶。^⑫正是凭着这层关系，张佩纶以低价购得了结一庐藏书。叶昌炽云：“庚寅（光绪十六年），子清歿，遗书八十柜，尽归张幼樵副宪。”^⑬但叶氏所言有误，结一庐藏书并未“尽归张幼樵副宪”。

缪荃孙云：“子清歿后，其家贱售之张幼樵前辈，价未清，书亦未全交。近得幼樵书目核之，朱有而张无者，或在子涵处，或系未交书。”^⑭又云：“迨丙申（光绪二十二年，1896）馆钟山，而子清又歿，书籍亦散，其精华悉归丰润张幼樵前辈，其奇零有归于荃孙者。子涵亦由直隶改官江南。一曰，持汲古抄本《金石录》，张燕公（说）、刘宾客（禹锡）、司空表圣（图）三唐人文集，明抄本中多夹籤，皆先生（指朱学勤）手校欲梓者，经理刻成，以

继先志。”^②由此可知，结一庐藏书之精华为张佩纶所得，少部分为缪氏所得，澄子及澄弟澐手中均有剩余，还有一些不知流归何处。盛极一时的“结一之藏”，就此烟消云散了。缪氏乃朱氏兄弟挚友，曾先后与二人订交，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。此外还有一佐证。检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中有朱澄辑《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》，子目四种，即宋赵明诚撰《金石录》三十卷，附缪荃孙撰《札记》、《今存碑目》各一卷；唐张说撰《张说之文集》二十五卷，《补遗》五卷；唐刘禹锡撰《刘宾客文集》三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；唐司空图撰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十卷。这与上文所引缪氏序言是相符合的，缪氏“经理刻成”之书即这部《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》。可见缪氏所言是绝对可信的。单从丛书名中的“剩余”二字，即可知“结一之藏”并未尽归佩纶了。另外，据缪氏所言，该丛书的辑者不应著录为朱澄，而应为朱学勤辑，缪荃孙补辑，《丛书综录》的著录是错误的。

然而“结一之藏”并未就此摆脱厄运。转入润于草堂（佩纶堂号）的结一庐藏书，未足二十年即遭灭顶之灾。叶德辉云：“至辛亥（1911）国变，尽其所有付之于狼烽马粪。”^③佩纶之子志潜云：“辛亥之乱，未及取出，遂毁于兵。”^④缪荃孙慨叹曰：“辛亥金陵失守，革党踞洪氏园，书籍狼藉，流出东洋犹其幸者，余不免衬马蹄当樵苏耳。长恩不佑，感慨系之。”^⑤书毁之惨状令人心痛。于兵火中幸存之余烬，有一部分流往海外。据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云：“就予所见，唐（塘）栖朱修伯侍郎之散，吾友江建猷（标）太史得《大金集礼》、《济南集》，皆旧抄本。”诚如缪氏所言，流至海外者尚属幸运，留在国内的，适园主人张钧衡所得不少，更多的则不知所终了。

结一庐藏书之散，表面看来只是仁和朱氏一家的悲剧，实则是一个国家历史的悲剧在文化上的缩影。国盛家兴，国破家亡，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。

注：

①③④⑥⑦《涧于集·文上·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大理寺卿军机处行走朱公神道碑》

②《涧于集·文上·祭外舅朱大理文》

⑤⑧⑫⑭缪荃孙撰《结一庐遗文存》

⑨⑲缪荃孙撰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卷四

⑩⑪⑬⑰⑳叶德辉撰《别本结一庐书目序》

⑭《辘轳语·语学第二》

⑮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

⑯谢兴尧著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·书林逸话》

⑰同注①。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池秀云编《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》中，误将朱学勤卒年作光绪十六年。

⑱《涧于集·文上·朱外姑马夫人六十寿序》

⑳《涧于集·书牋》

㉑顾志兴：《浙江藏书家藏书楼》中，误将佩纶作朱澄嫔。

㉒叶昌炽：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

㉓《涧于集·书牋后序》

㉔《艺风藏书续记》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图书馆